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际实践 及其微观生育效应*

——基于国际文献的元分析发现

张洋 姜春云 胡波

【摘要】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是多数低生育国家的政策选择,全面评估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现有国际经验研究成果为基础,运用元分析方法对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进行二次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各国实施的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其效应大小因具体情境而异。分孩次看,时间支持政策对二孩生育有正向效应,服务支持政策对二孩和三孩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经济支持政策对各孩次生育均无显著的影响。在生育率很低的($TFR < 1.5$)国家,上述3类政策的效应均相对更大;在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效应更大;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显著更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指出,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需要兼顾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孩次全覆盖原则,未来一段时期内应注重服务和时间支持为主、经济支持为辅的配套政策;同时,考虑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于生育支持配套措施的成本分担比例,探索适合不同发展水平的政策组合。

【关键词】生育支持 家庭政策 生育行为 元分析

【作者】张洋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姜春云(通讯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波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不少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相继下降到1.3以下,刷新了低生育率的历史记录(Kohler等,2002);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总和生育率也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动态轨迹视角下低生育率国家生育反弹的模式和机制研究”(22CRK010)的阶段性成果。

一度下降到 1.2 左右。截至 2022 年,除南欧和东欧部分国家外,欧洲大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回升至 1.5 以上;而东亚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在经历短暂回升后再次保持在 1.3 以下^①。面对低生育的发展困境,多数国家出台了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并逐步建成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②体系和福利制度。各国的政策实践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政策效果检验和评估。

与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相比,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直接检验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更强的政策意义,近年来日益占据主流位置。在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使用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大型截面调查或追踪调查数据,为理解不同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实际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然而,由于这些研究结果隐含了政策情境、研究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的复杂差异(Neyer 等,2008),因而其研究结论难以直接进行比较。

为了更好地梳理和整合国内外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发现,厘清不同类型政策的真实效应,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对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进行二次分析,重点回答以下 3 个研究问题:第一,哪些类型的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的生育行为具有稳健的促进效应?第二,不同类型的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否在不同孩次存在系统性差异?第三,不同类型的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否因情境(如生育水平、福利水平、性别平等程度)而异?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全面评估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也有助于为构建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内涵和主要模式

本文考察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特指直接影响生育且旨在支持生育的政策,按照其支持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 3 类: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其中,经济支持政策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时间支持政策包括产假、陪产假、家庭照护假、育儿假等;服务支持政策包括政府为孕产妇提供备孕、孕产等不同阶段的健康管理服务,为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提供的托育服务等(宋健、姜春云,2022)。

① 资料来源:世界生育数据库,网址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data/world-fertility-data>。

② 生育支持政策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区别于以往的生育抑制政策,是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提出的,为育龄人群和家庭提供有利于生育的各类支持和服务的一体化政策(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3)。家庭政策的意涵广泛,涵盖丰富的措施和福利,包括专门针对工作父母、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或针对全部有孩子家庭的措施和福利(Gauthier, 1996: 1)。本文的元分析聚焦于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国际文献,考虑到家庭政策也蕴含生育支持的理念(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3),为了忠于文献内容,同时凸显研究内容在中国的现实价值,故统一使用“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

各国实施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具体类型与国家制度结构、人口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有学者将欧洲和北美主要国家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归纳为5种模式,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东亚模式,并增加了时间支持维度的信息,汇总信息详见表1。在不同模式之间,国家的总体福利水平、政策类型(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及时间支持)的侧重各有不同。具体而言,北欧模式和保守主义模式的国家整体福利水平较高,但前者更侧重于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鼓励两性平等参与育儿;后者则侧重于现金支持和时间支持,主要

表1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主要模式及其特点

政策模式	总体福利水平	经济支持政策	服务支持政策	时间支持政策	代表性国家
北欧模式	福利水平较高、普惠,且以性别平等为政策价值导向	中等水平的现金补贴,具有完善的现金转移支付与减税体系	支持力度大,公共服务机构覆盖区域广,保障时间长	产假、育儿假和家庭照护假处于平均水平,国别差异大;假期越长,休假期间工资支付率越低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冰岛 挪威 瑞典
保守主义模式	福利水平中上,大部分倾向于支持传统分工	现金支持力度较大,鼓励女性亲自照料幼儿	支持力度中等,国别差异较大,根据就业情况提供不同的托幼服务	假期时间长,工资支付率高	奥地利 德国 爱尔兰 法国 荷兰 卢森堡
南欧模式	福利水平整体较低,政策碎片化,缺乏政策最低收入保障	现金补贴水平较低	托幼支持力度较弱	假期时间不长,工资支付率非常高,可达到60%~100%	希腊 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葡萄牙
自由主义模式	福利总体水平较低,向弱势群体(单亲、低收入等)家庭倾斜	现金补贴水平总体较低,弱势家庭得到的补贴较多	托幼支持主要依赖市场,同样对弱势家庭有明显倾斜	假期福利水平一般,国别差异大	英国 瑞士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东欧模式	福利水平差异较大,社会福利经历转型	现金补贴总体水平中等	支持力度总体较弱,国家处于转型期	假期时长和工资支付率都比较高,处于转型期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东亚模式	福利水平差异较大	现金补贴较高,国别差异明显	支持力度中等,服务投入较多	假期时长和工资支付率一致,国别差异小	日本 韩国

注:基于 Gauthier(2002)、吴帆(2016)、朱荟和陆杰华(2021)、Thévenon(2011)的研究整理而成。

鼓励女性育儿。南欧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和东欧模式的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以经济支持为主,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相对较弱。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对市场依赖较重,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更偏向于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东亚模式的国家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起步较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其总体福利水平、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政策的内部差异较大。

(二)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效果评估

关于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评估,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但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既有文献主要基于 3 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一是宏观数据,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 1990~2010 年期间,大多采用国家或者地区层面的数据检验不同类型的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Thévenon, 2011; Luci-Greulich 等, 2013);二是微观调查数据,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 2010 年至今,研究依托大型截面调查或追踪调查数据探究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的关系(Lappegård, 2010; Duvander 等, 2019; Lee 等, 2022);三是调查实验数据,近期有少数研究依托大型微观调查进行调查实验,以检验个体对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认知、态度及反应(Lui 等, 2021; 於嘉等, 2023)。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中,分析单位多为国家或地区,研究结论多聚焦在宏观生育指标上(如总和生育率),无法有效推断微观个体的生育行为。相较之下,基于微观数据的结论直接反映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其政策指导意义更明确。基于调查实验数据的研究能够很好地控制混淆因素的影响,但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文献数量少,且在政策类型、地区及时期维度的覆盖范围还相对有限,因此难以直接纳入元分析。鉴于此,本文主要对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成果(以下简称“微观研究”)进行文献汇总和分析。

现有文献中,微观研究成果数量丰富,但研究结论差异明显。从政策类型来看,关于经济支持政策,Whittington(1992, 1993)使用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与生育相关的联邦税收减免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Schellekens(2009)使用以色列普查数据发现,家庭生育津贴对不同胎次的生育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Rønsen(2004)基于北欧国家瑞典、挪威和芬兰的研究则发现,经济支持政策对生育行为几乎没有影响。关于时间支持政策,Averett 等(2001)基于美国的数据、Lappegård(2010)基于北欧国家的数据、Gerber 等(2012)基于俄罗斯的数据、Lee(2022)基于韩国的数据均发现,母亲的产假和父亲的育儿假期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有研究发现,育儿假对不同孩次的影响有差异(Rønsen, 2004; Duvander 等, 2019);还有研究发现,育儿假对生育行为没有影响或是负向影响(Duvander 等, 2019)。关于服务支持政策,有学者发现以托幼托育为主的育儿支持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el Boca, 2002; Baizan, 2009; Wood 等, 2019);也有研究发现,育儿支持对不同孩次的影响存在差异,在部分孩次,政策无效甚至存在抑制效应(Hank 等, 2003; Rønsen, 2004)。此外,在不同福利制度、性别平等

程度的情境下,不同类型的政策效果差异明显(Billingsley 等,2014;Luci-Greulich 等,2013;张洋、李灵春,2023)。例如,Luci-Greulich 等(2013)发现,经济补贴、有偿育儿假期、托育服务的效果在北欧福利模式下更显著;张洋和李灵春(2023)发现,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效果更明显。

本文选取以大型微观调查的截面或追踪数据为基础的微观研究成果,使用元分析方法进行文献汇总和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一是厘清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二是区分不同孩次、不同现实情境(生育水平、福利水平、性别平等程度)下政策效应的差异。通过这些研究,本文有以下3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系统梳理了现有基于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成果,定量估计了筛选所得样本国家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效应;第二,分析了政策效应在不同孩次、不同现实情境下的异质性,对深入理解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具有学术价值;第三,通过选取国内外已公开发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分析,有助于汇总既有研究发现,并从中总结规律性知识,对完善和优化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 元分析方法及数据准备

元分析(meta analysis)是指将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多项研究结果作为基础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获得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式(Stanley 等,2012:2)。本文关注的主题是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文献选取过程采用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检索和筛选。具体而言,使用“自变量+因变量”的组合形式检索文献。其中,自变量主要使用“pronatalist policy”“family policy”“fertility policy”“family-friendly policy”“financial incentives”“cash benefits”“allowance”“tax”“child benefits”“maternity leave”“paternity leave”“parental leave”“childcare”“daycare”等关键词;因变量主要涉及“fertility decision”“parenthood”“childbearing”“childlessness”“fertility behavior”等关键词。文献检索的范围包括 Web of Science、JSTOR、Wiley Online Library、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为保证文献中研究发现的可比性,本文对检索结果按照以下3条标准进一步筛选:第一,仅保留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成果;第二,保留以模型估计的发生比(OR)或相对风险(RR)来衡量政策效应的研究成果;第三,保留有国别独立政策效应的研究成果,剔除同时估计多个国家政策平均效应的研究,以便对不同情境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进行估计^①。

^① 由于涉及多个国家政策平均效应的研究难以直接测量其政策实施的现实情境,本文分析过程中剔除了这类文献;本文也尝试将这些涉及多国样本的文献纳入分析,所得结论与文中汇报的主要结论无明显差异,印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补充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灰色文献”,包括会议论文、工作论文、学位论文等,以减少发表偏倚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通过筛选和补充,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31 篇。文献筛选流程如图所示。

尽管文献数量的多少可能影响元分析对政策效应估计的稳健性(Guolo 等,2017),但受研究主题和研究设计等方面的限制,关于生育行为特定影响因素的元分析实际能够使用的样本数量通常较少。例如,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的 Matysiak 等(2008)基于以往的 29 项研究进行元分析,检验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关系;

发表在《Demography》的 Alderotti 等(2021)基于 49 项研究进行元分析,检验就业不稳定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尽管样本量较小,这些研究依然为系统理解和评估政策效应提供了有用的汇总知识。在本文最终保留的文献中,包含时间支持政策的效应值 26 个、服务支持政策的效应值 17 个、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值 7 个,能够满足具有可行性的元分析对效应值数量要求的下限(Alderotti 等,2021),本文所得数据可以支持元分析。表 2 概括了元分析使用的文献中关于 3 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基本结论。

(二) 变量处理与模型设置

在确定文献后,本文提取了文献中汇报或转换后的效应值、标准误、调查国家、调查时间等信息。最终使用的文献发表时间范围为 1992~2022 年,其经验数据调查的时间(本文所关注的“调查时间”)范围为 1977~2020 年,涵盖的国家有芬兰、挪威、瑞典、德国、西班牙、英国、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比利时、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

本文使用随机效应元分析模型(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 model)进行分析(Hedges, 1983)。该模型假定所选文献中的效应值不同,是来自一个更大研究总体的随机样本。元分析方法主要对不同研究的效应值($\ln OR$ 或 $\ln RR$)及其对应的标准误的集合 $\{(b_1, s_1), (b_2, s_2), \dots, (b_n, s_n)\}$ 进行分析。对于未报告标准误或其他对应统计指标(如 t 值或 p 值)的研究,本文借鉴 Stanley 等(2012:31)的做法进行处理,对未报告显著性且没有其他细节可用的文献,将 p 值设置为固定值 0.5,对应的 t 值为 0.67;对于仅标注显著性而没有其他细节可用的文献,将 p 值小于 0.1、0.05、0.01 对应的 t 值分别设为 1.64、1.96、2.58(李沛良,2001:391-392)。这些效应值与对应标准误的集合构成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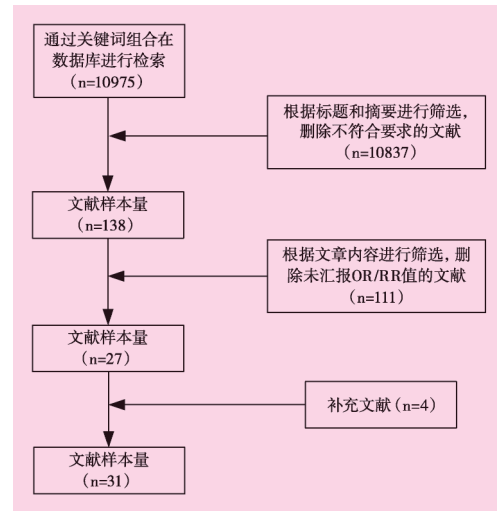


图 文献筛选过程

表2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总结

政策维度	基本结论	相关研究
时间支持政策	整体有效论:不同类别的时间支持政策整体上表现出生育促进效应	Averett 等(2001);Lappegård(2010);Gerber 等(2012); Lee(2022);Deiters(2017);Kim 等(2018);Mussino(2022);Kim 等(2020);Matysiak 等(2014)
	部分无效论:不同类别的时间支持政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无效或者生育抑制效应	Rønsen(2004);Parr 等(2011);Duvander 等(2019);Schaffnit 等(2017);Song 等(2018);Duvander 等(2010);Fahlén(2012);Yoon(2017)
服务支持政策	整体有效论:服务支持政策整体上表现出生育促进效应	Del Boca(2002);Baizan(2009);Wood 等(2019);Huber(2019);Wood(2019)
	部分无效论:服务支持政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无效或者生育抑制效应	Hank 等(2003);Rønsen(2004);Sinyavskaya(2010);Chang 等(2018)
经济支持政策	微弱有效论:不同类别的经济支持政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微弱的生育促进效应	Whittington(1992);Whittington(1993);Schellekens(2009);Biryukova 等(2016);Pajunen(2012);Erlandsson(2017)
	整体无效论:不同类别的经济支持政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无效或者生育抑制效应	Rønsen(2004);Lappegård(2010);Parr 等(2011)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具体而言,本文将与时间支持相关的育儿假、父亲假等政策统一界定为时间支持政策,将育儿津贴界定为经济支持政策,儿童照料机构的可及性界定为服务支持政策。根据变量类型一致性原则以及最大限度地保留具有可比性的效应值的准则,本文构造了时间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的虚拟变量^①(无=0,有=1),服务支持政策使用儿童照料机构覆盖率(childcare coverage)来衡量^②。

此外,为了检验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是否受现实情境的调节,本文进一步结合所提取的调查国家和调查时间构造政策情境变量,包括生育水平、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这些情境变量的具体构造思路如下。

首先,本文使用总和生育率(TFR)来衡量一国的总体生育水平,并代理反映其整体生育环境。“低生育陷阱”假说认为当TFR低于1.5时就会掉入陷阱并很难跳出(Lutz等,2006),尽管这一假说受到诸多质疑,但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加之,TFR是否低于1.5也是国际上关于“很低生育水平”的划分界限。据此,本文将各国按照TFR是否低于1.5

① 在所搜集的文献中,时间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操作化方式不一,其中,使用虚拟变量测量的研究汇报的效应值数量较多,且可比性更强;使用连续变量测量的研究存在测量尺度不统一、难以直接比较等问题。故本文对这两类政策使用虚拟化测量方式。
 ② 在所搜集的文献中,服务支持政策均以儿童照料机构覆盖程度(childcare coverage)来衡量服务支持政策。

作为标准构建生育水平的虚拟变量,低于 1.5 赋值为 0,等于或高于 1.5 赋值为 1。

其次,结合各文献涵盖的“调查国家”和“调查时间”信息,本文使用各国的家庭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生育福利水平,代理反映其对家庭生育的支持力度;相应数据来源于 OECD 家庭数据库^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各样本国家的家庭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重计算均值,以此为参考构建各国福利水平的虚拟变量,低于均值的界定为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②,赋值为 0,其余界定为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赋值为 1。

最后,鉴于性别平等程度也会影响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Billingsley 等,2014;张洋、李灵春,2023),本文使用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来衡量其性别平等程度,相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性别统计(gender statistics)数据库^③。对各样本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计算均值,以此为参考构建性别平等程度虚拟变量,低于均值的界定为性别平等程度较低,赋值为 0,其余界定为性别平等程度较高,赋值为 1。

四、实证分析

(一) 样本数据可靠性检验

为了保证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对选取的文献数据进行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发表偏倚主要指研究考察的效应在统计学上显著的论文更有可能被发表的选择性现象(Stanley 等,2012:52)。本文使用 Egger 检验的结果显示,时间支持政策、服务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对应截距的 p 值均大于 0.05(见表 3),说明本文使用的文献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问题。

异质性检验主要针对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即对多个独立样本之间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本文借鉴以往研究(Matysiak 等,2008)的做法,使用 Q 检验方法,结果显示(见表 3),

表 3 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

类别	K	发表偏倚检验(Egger 检验)		异质性检验(Q 检验)		
		p 值	95%置信区间	Q 值	df	p 值
时间支持政策	26	0.413	[-0.109,0.257]	141.39	25	0.000
服务支持政策	17	0.146	[-0.156,0.026]	38.89	16	0.009
经济支持政策	7	0.085	[-0.626,0.147]	35.71	6	0.000

注:上述结果为使用 stata18 软件估计所得,K 表示效应值个数;若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① 根据研究关注的时期长短,对单年份的研究使用当年的比重值,多年份的跨时期研究使用对应年份比重的均值。数据获取地址:https://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public_policy。

② 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数据不包含在 OECD 家庭数据库中,本文将俄罗斯归入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东欧模式中,在理论上将其划分为低福利水平国家。

③ 数据获取地址:<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gender-statistics>。

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Q检验均高度显著,拒绝样本不存在异质性的原假设。这表明,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效应大小不同,且相应差异并非抽样随机性所致,而是与其他结构性因素有关,因而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具有合理性。

(二) 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

表4汇报了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元分析估计结果。整体来看,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时间支持、服务支持、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值分别为1.130、1.042、1.225,表明有时间支持政策、经济支持政策的情况下,个体生育行为的发生比分别提高13.0%、22.5%,服务支持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生育行为的发生比增加4.2%。这说明,从国际经验来看,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生育促进效应真实存在。

(三) 分孩次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5报告了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分孩次的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由表5可见,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孩次差异。具

表4 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估计结果

政策	K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显著性	
				Z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26	1.130	[1.070,1.192]	4.437	0.000
服务支持政策	17	1.042	[1.020,1.065]	3.829	0.000
经济支持政策	7	1.225	[1.074,1.398]	3.026	0.002

注:效应值为OR值,后续表格中的效应值与此相同。

表5 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分孩次效应

政策	K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显著性	
				Z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一孩	5	1.097	[0.996,1.208]	1.874	0.061
二孩	16	1.214	[1.131,1.303]	5.357	0.000
三孩	5	0.949	[0.910,0.990]	-2.421	0.015
服务支持政策					
一孩	9	1.045	[0.999,1.092]	1.923	0.054
二孩	5	1.048	[1.012,1.086]	2.615	0.009
三孩	3	1.021	[1.006,1.036]	2.697	0.007
经济支持政策					
一孩	2	0.698	[0.273,1.786]	-0.750	0.453
二孩	3	1.403	[0.947,2.080]	1.687	0.092
三孩	2	1.330	[0.873,2.027]	1.329	0.184

体而言,时间支持政策对二孩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效应值为1.214;服务支持政策对二孩和三孩生育行为均有显著的影响,相应效应值分别为1.048和1.021;经济支持政策对各孩次生育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综合3类支持政策在不同孩次的效应来看,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政策均对二孩生育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二者对三孩生育的影响相反,前者为促进,后者则为抑制。这些政策效应的异质性需要在

政策设计和评估中予以关注。

(四) 政策实施情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6汇报了不同情境下对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效应差异的检验结果,估计结果显示,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会因生育水平、国家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而呈现差异。

从生育水平来看,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在低生育率(TFR < 1.5)国家更为明显,相应政策效应值分别为1.291、1.052和1.485。对于低生育率国家,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往往较低,提供优质的生育服务支持、实施凸显性别平等或鼓励男性参与的时间支持政策,由此营造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氛围有助于增强政策对个人生育行为的提升作用;经济支持政策有助于降低生育成本,从而强化政策对个人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在生育率相对较低的国家,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于提升个体生育行为均具有更加明显的效应。在生育率较高的国家,3类政策的效应也均显著为正,其效应大小略低于同等情况下低生育率国家的政策效应。

从不同福利水平的情境来看,时间支持政策和服务支持政策在低福利水平国家的效应值更大,分别为1.318和1.045;经济支持政策则在高福利水平国家的效应更加明显,其效应值为1.260。在不同福利水平的国家中,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但二者的效应均在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中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福

表6 不同情境下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

政策	K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显著性	
				Z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TFR < 1.5	7	1.291	[1.062, 1.571]	2.558	0.011
TFR ≥ 1.5	19	1.096	[1.039, 1.157]	3.337	0.001
福利水平高	19	1.091	[1.035, 1.149]	3.264	0.001
福利水平低	7	1.318	[1.062, 1.635]	2.506	0.012
性别平等程度较高	19	1.083	[1.029, 1.139]	3.069	0.002
性别平等程度较低	7	1.350	[1.096, 1.662]	2.823	0.005
服务支持政策					
TFR < 1.5	6	1.052	[1.021, 1.084]	3.322	0.001
TFR ≥ 1.5	11	1.034	[1.003, 1.067]	2.165	0.030
福利水平高	12	1.040	[1.010, 1.070]	2.645	0.008
福利水平低	5	1.045	[1.012, 1.078]	2.692	0.007
性别平等程度较高	12	1.044	[1.021, 1.068]	3.794	0.000
性别平等程度较低	5	1.009	[0.922, 1.105]	0.918	0.843
经济支持政策					
TFR < 1.5	4	1.485	[1.081, 2.040]	2.442	0.015
TFR ≥ 1.5	3	1.069	[1.033, 1.106]	3.824	0.000
福利水平高	4	1.260	[1.093, 1.452]	3.188	0.001
福利水平低	3	0.996	[0.570, 1.740]	-0.014	0.989
性别平等程度较高	5	1.221	[1.014, 1.388]	3.049	0.002
性别平等程度较低	2	0.838	[0.203, 3.459]	-0.244	0.807

利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个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更强(茅倬彦等,2021),因而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弱。对经济支持政策而言,其实施力度往往与国家福利水平密切相关,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支持政策的实施力度相对有限,以致其政策效应相对较小。

分性别平等程度来看,时间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效应更为明显,其效应值为1.350;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效果更为明显,相应效应值分别为1.044和1.221。究其原因,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时间支持政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影响,可能反映了相应时间支持政策包含父亲假、夫妻育儿假等具有性别平等意涵的支持政策的综合影响,单纯强调女性育儿假的时间支持政策则可能产生强化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消极影响(计迎春、郑真真,2018)。相比之下,服务支持政策的效应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服务支持政策的“去家庭化”属性相关,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通常更认同“家庭化”的托育模式,对市场化和公共托育服务的接受度较低(马春华,2022)。此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经济支持政策具有鲜明的家庭化导向,通过降低生育成本、鼓励女性回归家庭(朱荟、陆杰华,2021);相反,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支持政策有助于家庭通过购买正规化托育服务降低育儿经济压力,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进而释放更大的生育促进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其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学术界关于相应政策的效应评估也已初具规模,但研究结论比较零散,且存在争议。为了厘清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汇总分析了1992~2022年发表的国际高质量的微观定量研究文献,检验并估计了时间支持、服务支持、经济支持3类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政策效应,并探讨了相应政策在不同现实情境下影响的差异。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整体来看,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分孩次来看,时间支持政策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服务支持政策则对二孩和三孩生育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支持政策对所有孩次生育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3)从不同生育水平的国家来看,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生育促进效应在低生育率国家更为明显,但在生育率较高的国家相应政策效应也显著;(4)从不同福利水平的情境来看,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在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效应更为明显;(5)从不同性别平等程度的情境来看,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效应更为明显,时间支持政策则相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中国构建和完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应当体现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性原则和孩次全覆

盖原则,并兼顾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首先,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需要以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为主,以经济支持政策为辅。由于目前中国生育率相对较低,2020年的TFR仅为1.3,生育支持政策建设刚刚起步,家庭福利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公共照料供给不足(马春华,2022),子女教育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措施处于探索初期(茅倬彦、罗志华,2023),性别平等化水平与世界第一梯队国家仍有差距(吴帆、刘立光,2020)。结合这些阶段性特征和本文关于不同现实情境的分析结果,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需要被有侧重地关注,未来整体上应该重视完善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例如,确保“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的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的目标高质量实现,完善涵盖父亲和母亲在内的注重性别平等的时间支持政策。这一过程中,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发展助推家庭福利水平和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逐步提升;在后续发展阶段,充分发挥经济支持政策在较高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水平情境下的突出作用。

其次,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的完善需要具有孩次全覆盖和差异性思维。本文分孩次的分析结果表明,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一孩生育行为的效应较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应政策在一孩生育方面的投入不足或倾向性不够所致(房莉杰、陈慧玲,2021;宋健、姜春云,2022)。结合中国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近20年一孩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二孩生育率呈上升趋势并一度超过一孩生育率(陈卫,2021)。在这一人口背景下,当前生育支持的政策实践并不完全合理,如在大部分地区(云南省、杭州市、哈尔滨市、济南市和攀枝花等)现金补贴政策集中于二孩和三孩家庭(茅倬彦、罗志华,2023)。生育政策的宽松化背后蕴含着生育权利回归“自主”(胡湛、彭希哲,2019),上述逆向探索路径可能存在“鼓励多生”的行政色彩,但一孩生育行为的实现是后续孩次生育的前提,仅仅聚焦于高孩次生育支持的效益较小且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在未来完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将政策范畴拓展到一孩生育环节,并在整体上提升不同孩次生育的配套支持水平,为承担抚幼责任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系统性的支持,从而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最后,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完善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建设和完善是一项制度成本巨大的社会发展事业,有预测指出,2025年中国仅生育津贴和托育事业常态化投入将高达约2823亿元(史毅、韩润霖,2023)。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差异明显,不同地区与生育支持相关的政策投入力度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的家庭福利水平明显不同。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应会因福利水平的高低而呈现异质性。因此,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完善需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福利水平,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担比例并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动态调整。例如,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可以

加大完善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力度,辅之以经济支持政策,尤其侧重于对低孩次的覆盖;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可以在完善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经济支持力度,侧重于低孩次覆盖的同时兼顾对高孩次的经济支持。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够为探索不同的政策组合提供“试验场”,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的政策尝试,可以为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地区提供前瞻性政策指导。

本文也存在不足。第一,本文检索所得的文献无法代表所有实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家,尤其是关于亚洲国家的文献较少。由于现有文献大多认为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效果不佳(宋健、姜春云,2022),缺乏这些国家的研究可能会导致高估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生育促进效应。第二,本文仅根据代表性政策估计了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由于各类政策还包含其他政策内容(房莉杰、陈慧玲,2021;宋健、姜春云,2022),受限于筛选所得文献的内容和数量(具体政策缺失或研究数量不足),本文仅能依据代表性的政策进行估计。第三,现实中政策类型往往以组合形式出现,已有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或聚类分析方法对相关政策的效果进行组态评估(茅倬彦等,2021;张洋、李灵春,2023),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政策组合效应的存在性,但尚未对微观层面生育行为及其效应进行确切的定量估计。考虑到元分析“忠于原文”的特性,受限于获得的文献数量不足、政策内容单一等问题,本文未能估计组合政策的效应。关于本文研究结果的解读,需要考虑上述局限。这些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在数据可得的情形下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陈卫(2021):《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三孩政策——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5期。
2. 房莉杰、陈慧玲(2021):《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人口学刊》,第2期。
3. 胡湛、彭希哲(2019):《重新诠释“计划生育”的内涵——实现“家庭自主生育”转型并避免误读“鼓励生育”》,《探索与争鸣》,第1期。
4. 计迎春、郑真真(2018):《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5. 李沛良(2001):《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马春华(2022):《去家庭化和儿童非正规照顾:欧洲跨国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7. 茅倬彦等(2021):《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8. 茅倬彦、罗志华(2023):《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9. 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3):《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欧洲实践与中国思考》,《西北人口》,第3期。
10. 宋健、姜春云(2022):《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国际观察》,《人口与健康》,第6期。
11. 史毅、韩润霖(2023):《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内涵、价值与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12. 吴帆(2016):《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社会学研究》,第1期。

13. 吴帆、刘立光(2020):《社会性别平等的测量:国际指数与中国性别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14. 於嘉等(2023):《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15. 张洋、李灵春(202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人口研究》,第4期。
16. 朱荟、陆杰华(2021):《现金补贴抑或托幼服务?欧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应探析》,《社会》,第3期。
17. Alderotti G., Vignoli D., Baccini M., et al.(2021), Employment Instability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A Meta-Analysis. *Demography*. 58(3): 871-900.
18. Averett S.L., Whittington L.A.(2001), Does Maternity Leave Induce Birth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8(2): 403-417.
19. Baizan P.(2009), Regional Child Care Availability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in Spain. *Demographic Research*. 21: 803-842.
20. Billingsley S., Ferrarini T.(2014),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21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2): 428-445.
21. Biryukova S., Sinyavskaya O., Nurimanova I.(2016), Estimating Effects of 2007 Family Policy Changes on Probability of Second and Subsequent Births in Russia.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WP BRP 68: 1-31.
22. Chang I., Kim B.(2018), Influencing Factors to Have an Additional Child by Working Women in Korea.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5(2): 116-127.
23. Deiters M.(2017), Policy Receptiveness as a Determinant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German Child Care and Women's Transition to First Birth. *Stockholm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1-35.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44060708>.
24. Del Boca D.(2002), The Effect of Child Care and Part Time Opportunities on Participation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in Ital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5(3): 549-573.
25. Duvander A.Z., Lappegård T., Andersen S.N., et al.(2010),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Fathers' and Mo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and Continued Childbearing in Norway and Swede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 45-57.
26. Duvander A.Z., Lappegård T., Andersen S.N., et al.(2019),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and Continued Childbearing in Iceland, Norway, and Sweden. *Demographic Research*. 40: 1501-1528.
27. Erlandsson A.(2017), Child Home Care Allowanc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econd- and Third-Order Births in Finland.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6(4): 607-630.
28. Fahlén S.(2012), Family-Friendly Working Conditions and Childbearing: A Capability Approach to Fertility Behaviour among Young Adult Women in Sweden. *Stockholm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1-14.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150963080>.
29. Gauthier A.H.(1996),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30. Gauthier A.H.(2002),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s There Convergence?. *Population*. 57(3): 447-477.
31. Gerber T.P., Perelli-Harris B.(2012), Maternity Leave in Turbulent Times: Effects on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and Fertility in Russia, 1985-2000. *Social Forces*. 90(4): 1297-1322.

32. Guolo A., Varin C. (2017), 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 The Number of Studies Matters.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26(3):1500-1518.
33. Hank K., Kreyenfeld M. (2003),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hild Care and Women's Fertility Decisions in Western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3):584-596.
34. Hedges L.V. (1983), A Random Effects Model for Effect Siz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3(2):388-395.
35. Huber K. (2019), The Role of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 for the Effect of Public Child Care on Fertility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Passauer Diskussionspapiere Volkswirtschaftliche Reihe*. 77(19):1-49.
36. Kim J., Nancy L. (2018), Domestic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the Transition to Second Birth in South Korea. Denver: PAA 2018 Annual Meeting.
37. Kim J., Nancy L. (2020), Lowest-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Policy and Domestic Labor Supports and the Transition to Second Birth. *Social Forces*. 99(2):700-731.
38. Kohler H.P., Billari F.C., Ortega J.A. (2002),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4):641-680.
39. Lappegård T. (2010), Family Policies and Fertility in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6(1):99-116.
40. Lee Y. (2022), Is Leave for Fathers Pronatalist?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the Impact of Fathers' Uptake of Parental Leave on Couples' Childbearing Intentions in South Kore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41(4):1471-1500.
41. Luci-Greulich A., Thévenon O. (2013),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4):387-416.
42. Lui L., Cheung A.K. (2021), Family Policies, Social Norms and Marital Fertility Decision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30(4):396-409.
43. Lutz W., Skirbekk V., Testa M.R. (2006),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4:167-192.
44. Matysiak A., Vignoli D. (2008),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A Meta-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4(4):363-384.
45. Matysiak A., Szalma I. (2014), Effects of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on Second Birth Risks and Women's Employment Entry. *Population*. 69(4):599-636.
46. Mussino E. (2022), Do Leave Policies Impact Fertility? The Case of Immigrants from Low-Fertility Countries in Sweden. In: Ivana Dobrotić., Sonja Blum., and Alison Koslowsk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Leave Polic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155-171.
47. Neyer G., Andersson G. (2008), Consequences of Family Policies on Childbearing Behavior: Effects or Artifac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4(4):699-724.
48. Pajunen A. (2012), Child Home Care Allowanc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econd and Third Births in Finland. *Stockholm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1-47.
49. Parr N., Guest R. (2011), The Contribution of Increases in Family Benefits to Australia's Early 21st-Century Fertility Increa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Demographic Research*. 25:215-244.
50. Rønsen M. (2004), Fertility and Public Policies—Evidence from Norway and Finland. *Demographic Research*. 10:143-170.
51. Schaffnit S.B., Sear R. (2017), Support for New Mothers and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Not All Support is Equal in the Decision to Have a Second Child. *Population Studies*. 71(3):345-361.

52. Schellekens J.(2009) ,Family Allowances and Fertility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Demography*. 46(3) :451–468.
53. Sinyavskaya O., Tyndik A.(2010) ,Social Capital and Gender Equity in Explaining Fertility Behavior in Russia. Vienna: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1–36. <http://epc2010.princeton.edu/abstractViewer.aspx?submissionId=100630>.
54. Song H., Jo H.(2018) ,The Effects of Father’s Parental Leave on the Second Birth in Korea. *Proceedings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 Finance* :1–25.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198712200>.
55. Stanley T.D., Doucouliagos H.(2012)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ew York: Routledge:2;31;52.
56. Thévenon O.(2011)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1) :57–87.
57. Whittington L.A.(1992) ,Taxes and the Family:The Impact of the Tax Exemption for Dependents on Marital Fertility. *Demography*. 29(2) :215–226.
58. Whittington L.A.(1993) ,State Income Tax Policy and Family Size:Fertility and the Dependency Exemption. *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21(4) :378–398.
59. Wood J., Neels K.(2019) ,Local Childcare Availability and Dual-Earner Fertility:Variation in Childcare Coverage and Birth Hazards Over Place and Tim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5(5) :913–937.
60. Wood J.(2019) ,Social Differentials in the Effect of Formal Childcare o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An Assessment of Varying Effects by Education, Working Hours and Migration Background.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42:1–11.
61. Yoon S.(2017) ,The Influence of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Families on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in South Korea. *Demographic Research*. 36:227–254.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Individuals' Fertility Behavio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Zhang Yang Jiang Chunyun Hu Bo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global empirical studies,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time, and service-based fertility-support policies on individual fertility behaviors, also exploring the variations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by total fertility rates (TFR), welfare levels, and gender equity levels.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positively influence fertility behaviors. Time support impacts second birth, service support impacts second and third birth, while economic support has no effect, irrespective of birth orders. Time and service support is more effective in countries with TFR below 1.5 or with lower welfare levels. Service and economic support is more effective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gender equity. Considering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design of family policies should consider variations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irth order, prioritizing service and time support with economic support as supplementary.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djusting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exploring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policies according to regional disparities.

Keywords: Fertility Support; Family Policy; Fertility Behavior; Meta Analysis

(责任编辑:牛建林)